姚鼐学术思想述论

□ 李 帆

摘 要:姚鼐的学术思想是其文章理论、文学思想的基石,集中反映了桐城派文人的思想、学术观念。他以理学为宗,非常尊崇程、朱,同时又能吸纳汉学考据之长,进而提出义理、考证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,以宽容的心态兼收各家学说,其所为远非那些严守门户、固步自封的理学家可比。

关键词:姚鼐;学术思想;程朱理学;汉学

中图分类号:K207.8 文献标识码:A 文章编号:1671-8402(2006)10-0117-06

桐城派是清代最著名的文学流派之一。该派文人中,姚鼐是核心人物,其文章理论、文学思想受到多方推崇,其学术思想也有较大影响。学术界对姚鼐的文章理论、文学思想关注较多,研究成果颇丰[1]。但相对而言,对其学术思想有所忽略[2]。实际上,姚鼐的学术思想与其文章理论、文学思想密不可分,甚至可以说是其文章理论、文学思想的基石,而且是对桐城派思想、学术观念的集中反映。所以,非常值得深入分析与总结。

一、尊崇程朱理学

姚鼐(1732~1815年),字姬传,一字梦谷。以书斋名"惜抱轩",世称"惜抱先生"。少年时家境不佳,体弱多病,然一心向学,志向远大。伯父姚范和同里学者刘大櫆分别授其经学和古文义法。乾隆十五年(1750年)中举。乾隆二十八年(1763年)进士及第,授庶吉士。后补礼部仪制司主事,曾分别充当山东、湖南乡试副考官,还曾充当过会试同考官,并任过刑部郎中。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,被选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。在馆不到两年,即辞官归里。从乾隆四十二年(1777年)起,直到嘉庆二十年(1815年)去世为止,将近40年间,始终是在书院讲学生涯中度过,先后在扬州、安庆、徽州、江宁等地,主讲于梅花、敬敷、紫阳、钟山等书院中。平生著述颇多,有《惜抱轩诗文集》、《惜抱尺牍》、《九经说》、《春秋三传补注》、《国语补注》、《老子章义》、《庄子章义》等,选编《古文辞类纂》等。

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,兼有方苞、刘大櫆之长。经由他及其所培养的众多弟子的努力,桐城文派走向鼎盛之期。除了文学贡献外,他也是位经学家,治经颇有心得和造诣。在学术思想方面,他以理学为宗,非常尊崇程、朱,但同时又能吸纳汉学考据之长,并不固步自封。

在姚鼐心目中,程、朱之地位犹如父、师。他说:

> 儒者生程、朱之后,得程、朱而明孔、孟之旨,程、朱犹吾父、师也。然程、朱言或有失,吾岂必曲从之哉?程、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?正之可也,正之而诋毁之,讪笑之,是诋讪父、师也。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、朱之行,而其意乃欲与程、朱争名,安得不为天之所恶。故毛大可、李刚主、程绵庄、戴东原,率皆身灭

作者简介:李帆,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副院长。

?1994-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嗣绝,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。[3]

即程、朱之学可“正之”,但不能诋毁、讪笑,否则便是“诋讪父、师”,要遭天谴,毛大可(毛奇龄)、李刚主(李塨)、程绵庄(程廷祚)、戴东原(戴震)正因如此,才“身灭嗣绝”[4]。可见他极为崇尚程、朱之学,不能容忍对程、朱的任何攻击,哪怕攻击者是前辈学者。

姚鼐之所以如此尊崇程、朱,主要是由于他认为程、朱之说最能继承孔、孟之统。他说:

论继孔、孟之统,后世君子必归于程、朱者,非谓朝廷之功令不敢违也,以程、朱生平行己立身,固无愧于圣门,而其论说所阐发,上当于圣人之旨,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,为大且多。使后贤果能笃信,遵而守之,为无病也。[5]

夫圣人之经,如日月星之悬在天上,苟有蔽焉则已,苟无蔽而见而言之,其当否必有以信于人。见之者众,不可以私意狥也。故窃以谓说经当一无所狥。程、朱之所以可贵者,谓其言之精且大,而得圣人之意多也,非吾狥之也。[6]

即后人尊崇程、朱,并非是迫于“朝廷之功令不敢违”,而是出于对他们学说的信奉,因其说“继孔、孟之统”;“上当于圣人之旨,下合乎天下之公心”。而且圣人之经昭昭;“如日月星之悬在天上”;“不可以私意狥也”,所以说程、朱之言可贵,“得圣人之意多也”,非徇私之语。

此外,在姚鼐眼里,程、朱生平行止;“无愧于圣门”,可为道德楷模,这也是其值得尊崇的缘由。他说:

自秦、汉以来,诸儒说经者多矣,其合与离固非一途。逮宋程、朱出,实于古人精深之旨,所得为多……而其生平修己立德,又实足以践行其所言,而为后世之所向慕。故元、明以来,皆以其学取士。[7]

可见程、朱注重“修己立德”,以实际行动践行己之主张,值得后人向往。值得注意的是,姚鼐这样说,并非空发议论,而是有其针对性的。他是鉴于当时的一些士子,或不学无术,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;或仅将研习程、朱作为参加科考求取功名的工具,以此得到富贵,故有感而发:

数十年来,士不说学,衣冠之徒,诵习圣人之文辞,衷乃泛然不求其义……闻耆耇长者考论经义,欲掩耳而走者皆是也。风俗日颓,欣耻益非其所,而放僻靡不为。……鼐少时见乡前辈儒生,相见犹论学问,退习未尝不勤,非如今之相师为也。所谓‘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’者欤![8]

利禄之途一开,为其学(按指程朱理学)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。[9]

所以姚鼐之“向慕”程、朱,是有现实考虑的,并非仅出于对程、朱在学理上的认同。

正由于姚鼐崇信程、朱学说是基于其最能继承孔、孟之统,并有现实关怀的成分在内,故而他之于程朱理学,并非亦步亦趋,可以说既不盲目崇拜,也不教条吸纳,而是能以清醒的头脑较为客观地看待其优劣短长。如他认为程、朱确系“得圣人之意多也”,但非百分之百正确,如果发现其解释有不合圣贤之意处,后人是可以舍弃或纠正的,即:

若其言无失而不达古人之意者,容有之矣。朱子说元、亨、利、贞,舍孔子之说者,欲以达文王之意而已。苟欲达圣贤之意于后世,虽或舍程、朱可也。[10]

程、朱言或有失,吾岂必曲从之哉?程、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?正之可也。[11]

也就是说,姚鼐看待程、朱的标准是能否达古圣贤之意,如不能达之,舍弃或纠正程、朱之言是完全可以的。换句话说,在姚鼐心目中,古圣贤之意才是根本,才是需谨遵恪守的信条,程、朱作为古圣贤的代言人;“得圣人之意多也”,所以其学说非常值得尊敬,但无法做到绝对正确。

以上所述,表明姚鼐虽尊崇程、朱,但未将其神化,还是抱有自己的见解的。也正由于此,他关于义理的某些看法并非与程、朱全然相同。当然,姚鼐不是哲学家,而是文学家,所以他没有系统的义理著作,义理方面的见解只是散见于各类文章和作品中,而且以实行实用为主,少谈虚理。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“理”。程、朱谈“理”,站在形而上的高度,哲学色彩甚浓;姚鼐谈“理”,则基于文学创作的实际,认为文学创作中的规律即为“理”。他说:

吾尝以谓文章之原,本乎天地;天地之道,阴阳刚柔而已。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,皆可以为文章之美。阴阳刚柔,并行而不容偏

?1994-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废。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,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,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,则必无与于文者矣。然古君子称为文章之至,虽兼具二者之用,亦不能无所偏优于其间,其故何哉?天地之道,协合以为体,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,理固然也。其在天地之用也,尚阳而下阴,伸刚而绌柔,故人得之亦然。文之雄伟而劲直者,必贵于温深而徐婉;温深徐婉之才,不易得也。然其尤难得者,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。[12]

在这里,姚鼐以天地之"道",讲文章之"理"。他认为,天地之"道"与文章之"理"是相统一的;"文章之原,本乎天地",而天地之"道",不外乎"阴阳刚柔",所以为文兼具"阴阳刚柔"四者,便为"文章之美"。当然,"天地之道,协合以为体,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,理固然也。"文章之"理"也是如此。实际上,"文章之美"为"得乎阴阳刚柔之精"的说法,表明姚鼐已认识到文学创作之"理"在于顺应自然规律,真实的反映客观自然。

除了讲为文之"理"外,姚鼐对理学家常谈的气、心、性、命、情等义理命题很少涉及,所以其对程朱之道的维护,更多表现在对理学家所倡导之道德原则的坚持上。如他十分推崇忠义、孝义、节义等道德操守,认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为可贵之处。他说:

天地无终穷也,人生其间,视之犹须臾耳。虽国家存亡,终始数百年,其逾于须臾无几也。而道德仁义忠孝名节,凡人所以为人者,则贯天地而无终敝,故不得以彼暂夺此之常。[13]

与国家存亡相比,"道德仁义忠孝名节"才是贯天地而始终的,彼暂此常,最值得提倡的便是此传之久远的道德操守。对此道德操守,姚鼐在其作品中以各种实例加以解说,不遗余力地褒扬和传扬。

二、吸纳汉学之长

值得注意的是,姚鼐虽加意维护程、朱,但其非为抱残守缺之人,而是较为通达,能兼容其它学说,甚至能吸纳汉学之长。乾隆二十年(1755年),他曾写信给戴震,议及戴之所作《考工记图注》,并欲求为弟子。戴震回复曰:

仆于《考工记图》,重违知己之意,遂欲删取成书,亦以其义浅,特考核之一端,差可自决。足下之教,其敢忽诸!至欲以仆为师,则别有说。非徒自顾不足为师,亦非谓所学如足下,断然以不敏谢也。古之所谓友,固分师之半。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,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,苟有过则相规,使道在人不在言,斯不失友之谓,固大善。[14]

戴震非好为人师者,加之其它考虑,没有接受姚鼐的请求,但他很重视姚鼐对《考工记图注》所提之建议,愿与之"交相师"[15]。这表明,在学术上,青年姚鼐(时为23岁)是倾心戴震之学的,至少与戴震是有共同语言的,其所关注者为戴震之考据学成果。当然此时戴震还未写作《孟子字义疏证》等著作,义理上还认同程、朱,这种立场也与姚鼐相似,双方有"交相师"的前提。由于姚鼐后来的学术主张发生变化,故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,其文集不载与戴震书,但《东原文集》中的《与姚孝廉姬传书》还是使我们确知姚鼐有服膺戴震之学的经历。

尽管姚鼐后来对戴震等汉学家立异程、朱的做法不满,认为他们"诽鄙程与朱,制行或异旃",从而发出"世有宋大儒,江海容百川。道学一旦废,乾坤其毁焉!"的感叹[16],甚至如前引之文所言,咒骂戴震等人"身灭嗣绝",卫道立场十分鲜明,但综观他之学行,却也并非一概反对汉学考据。他对汉学的攻击,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,一是认为汉学"守一家之偏",二是指责汉学为"穿凿琐屑"之学。

针对当时汉学当道,学者热衷于专门经学的情形,姚鼐批评道:

当明时,经生惟闻宋儒之说,举汉、唐笺注屏弃不观,其病诚隘。近时乃好言汉学,以是为有异于俗。夫守一家之偏,蔽而不通,亦汉之俗学也,其贤也几何?[17]

孔子没而大道微,汉儒承秦灭学之后,始立专门,各抱一经,师弟传受,侪偶怨怒嫉妒,不相通晓,其于圣人之道,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。[18]

这两段话无非是说倡言汉学,系"守一家之偏,蔽而不通",这种汉学"各抱一经,师弟传受";"其于圣人之道,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",根本无法通圣人之道。与之相较,宋儒才算是真通圣人之道,即:

宋之时,真儒乃得圣人之旨,群经略有定说;元、明守之,著为功令。当明佚君乱政屡

?1994-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作,士大夫维持纲纪,明守节义,使明久而后亡,其宋儒论学之效哉![19]

在姚鼐眼里,汉学之弊除了“守一家之偏”、不通圣人之道外,还在于它以“穿凿琐屑”之学而诋程、朱。他说:

近时阳明之焰熄,而异道又兴。学者稍有志于勤学法古之美,则相率而兢于考证训诂之途,自名汉学,穿凿琐屑,驳难猥杂。其行曾不能望见象山、阳明之伦,其识解更卑于永嘉,而辄敢上诋程、朱,岂非今日之患哉![20]

明末至今日,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,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,于是专求古人名物、制度、训诂、书数,以博为量,以窥隙攻难为功,其甚者欲尽舍程、朱而宗汉之士。枝之猎而去其根,细之蒐而遗其钜,夫宁非蔽欤![21]

即汉学盛行,学界“以窥隙攻难为功”,实为舍本逐末,搜细遗巨,识见低下,而且“穿凿琐屑,驳难猥杂”,以此“上诋程、朱”,自然属“今日之患”。

平心而论,若去除因崇程、朱而对汉学肆意诋毁的感情色彩[22],姚鼐对汉学的某些批评也并非全然无理,如说汉学“琐屑”,务为饾饤之学,甚至“守一家之偏”,确是说到了汉学的某些痛处。所以不能一看到姚鼐因卫道而攻击汉学的言论,就不加分析的一概否定,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吸纳其合理之处。实际上,姚鼐对汉学之长亦非视而不见,尤其是当汉学之见有助于宋儒之学时。他曾说过这样的话:

夫汉人之为言,非无有善于宋而当从者也;然苟大小之不分,精粗之弗别,是则今之为学者之陋,且有胜于往者为时文之士,守一先生之说而失于隘者矣。博闻强识,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,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。[23]

就是说,汉学家的成就不是一无是处,其有助于宋儒之学之处该当从之,但不能大小不分,精粗不别。当然,作为崇理学的学者,姚鼐心目中汉学的位置要低于理学,汉学可以辅助理学,但不能超越理学,即所谓“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,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”。这表明他是将汉学视为理学的补充,只要汉学诂训有利于宋儒义理,就采纳之,汉学在他那里成了一个完善义理的工具。

正由于姚鼐抱有容纳汉学的心态,而且又处在汉学盛行、学风趋实的大环境下,所以他对经史训诂之学也有所尝试,其所作《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》、《项羽王九郡考》等,都是纯考辨性的文章。他的《九经说》虽以阐明经义为主,不完全同于汉学家的字句考订之作,但颇能融汇众说,不墨守成规。书中撷取儒家经书中的有关内容,分列为专题,考证其实,辨析其义,阐发其理;每经皆概述该经源流、卷数分合及前人研究大略,举各家之说于前,列己说于后,对汉儒经说与宋儒义理兼收并蓄,遇有疑点,择善而从。以是之故,该书颇为学者所重,如陈澧就曾评价道:

姚姬传《九经说》,实有家法,过望溪(按方苞号望溪)远甚,虽《学海堂经解》不收,要自可传。[24]

可见,姚鼐绝非抱残守缺的理学家,他宗理学,但能兼收它学之长,尤其是作为时学标志的汉学之长,而非落伍于时代。正缘于此,他才能提出著名的义理、考证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。

三、义理、考证、文章相结合

在《复秦小岘书》中,姚鼐指出:

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,有义理、文章、考证三者之分,异趋而同为不可废。一途之中,歧分而为众家,遂至于百十家。同一家矣,而人之才性偏胜,所取之径域,又有能有不能焉。凡执其所能为,而诋其所不为者,皆陋也,必兼收之乃足为善。若如鼐之才,虽一家之长,犹未有足称,亦何以言其兼者?天下之大,要必有豪杰兴焉,尽收具美,能祛末士一偏之蔽,为群材大成之宗者。鼐夙以是望世之君子,今亦以是上陈之于阁下而已。[25]

姚鼐此言,是说为学要兼有义理、考证、文章三者之长,将宋儒之性道与汉儒之经义相结合、考据与文章相统一。义理、考证、文章三途之中,又可分出各家;“而人之才性偏胜”,所以那种“凡执其所能焉,而诋其所不为者”的做法是“陋”;“必兼收之乃足为善”。姚鼐有这样的观念,不尽完全出于学术上的自觉,当时汉学当道的学术潮流,考据之风盛行以及所导致的文风的改变,使得他必须做出某种妥协,以保护理学和古文。就像曾国藩之所言:

当乾隆中叶,海内魁儒畸士,崇尚鸿博,繁称旁证,考核一字,累数千言不能休。别立帜

?1994-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志,名曰“汉学”。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,以为不足复存,其为文尤芜杂寡要。姚先生独排众议,以为义理、考据、词章,三者不可偏废,必义理为质,而后文有所附,考据有所归。[26]

即在汉学摈斥理学的大前提下,姚鼐方有“义理、考据、词章三者不可偏废”之说,其现实针对性是很明显的。而且在姚鼐心目中,三者必以义理为根本,“而后文有所附,考据有所归”。可见,主张“义理、考据、词章三者不可偏废”,并不意味着要降低义理的地位,以程朱理学作为桐城派主导思想的观念也未改变。

关于义理、考证、文章三者的具体关系,姚鼐也有过解释。他说:

鼐尝论学问之事,有三端焉:曰义理也,考证也,文章也。是三者,苟善用之,则皆足以相济;苟不善用之,则或至于相害。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,固文之贵也;寡闻而浅识者,固文之陋也。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,其辞芜杂俚近,如语录而不文;为考证之过者,至繁碎缴绕,而语不可了当,以为文之至美,而反以为病者,何哉?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,而智昧于所当择也。夫天之生才,虽美不能无偏,故以能兼长者为贵。而兼之中,又有害焉。岂非能尽其天之所与之量,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难得欤?[27]

义理、考证、文章三者相结合,“苟善用之,则皆足以相济;苟不善用之,则或至于相害”,因这三个方面,各自有其相对的独立性,又相互联系。为学、为文之时,能三者兼长,博涉旁通,自然是极为可贵的,但若过于强调某一方面,就会出现弊害,如“言义理之过者,其辞芜杂俚近,如语录而不文;为考证之过者,至繁碎缴绕,而语不可了当”;或者力求兼长,而又处理不当,则会相互妨害,所谓“兼之中又有害焉”。可以说,义理、考证、文章三者俱佳,是很高程度的要求,它需要为学、为文者既要讲求宋学家的义理,又要讲求汉学家的考据,还要讲求文章家的词章,兼采三家之长。若用现代概念表述,义理指哲学,考据指历史学,词章指文学,那么文史哲兼通的学者方可称上乘。当然,姚鼐是文学家,他的义理、考证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,同时也是一种文学理论或文章理论。在这个意义上,其所谓义理就是指文章立言之旨,对他而言,主要即为儒家经义,特别是程朱理学;所谓考证,就是要求写文章要材料确凿,实事求是,不为空言;所谓文章,就是要求讲究行文的字句章法,力求将文章写得明白晓畅,富于韵味。这样的要求,既不同于理学家“作文害道”的主张,又能矫正汉学家以考核为重而不讲文章技巧的偏颇,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,是有相当积极的意义的。

实际上,姚鼐的义理、考证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,并非完全出于自创,戴震也曾讲过类似的话,他说:

古今学问之途,其大致有三:或事于理义,或事于制数,或事于文章。事于文章者,等而末者也。然自子长、孟坚、退之、子厚诸君子之为之,曰“是道也,非艺也。”以云道,道固有存焉者矣,如诸君子之文,亦恶睹其非艺欤?夫以艺为末,以道为本。诸君子不愿据其末,毕力以求据其本,本既得矣,然后曰是道也,非艺也。……圣人之道在《六经》。汉儒得其制数,失其义理;宋儒得其义理,失其制数。譬有人焉,履泰山之巅,可以言山;有人焉,跨北海之涯,可以言水。二人者不相谋,天地间之钜观,目不全收,其可哉?抑言山也、言水也,时或不尽山之奥、水之奇。[28]

戴震此言,将古今学问分而为三:“理义、制数、文章,制数即等同于考证。三者之中,文章虽系“等而末者也”,但其可以载道,特别像司马迁、班固、韩愈、柳宗元的文章是载道之大本。至于制数、义理,汉儒、宋儒各得其一端,都不能完“圣人之道”,二者只有结合起来,才能睹此“天地间之钜观”。此外,戴震弟子段玉裁亦曾言道:

始,玉裁闻先生(即戴震)之绪论矣,其言曰:“有义理之学,有文章之学,有考核之学。义理者,文章、考核之源也,熟乎义理,而后能考核,能文章。”[29]

即在戴震眼里,义理、文章、考核三者之中,义理为本,“熟乎义理,而后能考核,能文章”。这与姚鼐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。不过若从时序而论,也可能是戴震启示了姚鼐。当然两人的出发点各有侧重,戴震重在讲治学,姚鼐则更注重作文之法,而且两人对义理之内涵的理解也非一致,这都是不能不提及的。

?1994-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义理、考证、文章之外，姚鼐还主张为学要兼收各派之长，宋儒理学外，儒家的各个学派、老庄学说以及佛教思想等，都在他兼收之列。所以如此，主要在于他认为：

> 天下道一而已，贤者识大，不贤者识小。贤者之性，又有高明沈潜之分，行而各善其所乐。于是先王之道有异统，遂至相非而不容并立于天下，夫恶知其始之一也。[30]

这里所谓"道"，显然不限于孔孟之道，而是指"天下"之法则。此"道"为一；"贤者识大，不贤者识小"，各有探寻之途，故而应兼收并蓄，以达求"道"之目的。正是基于此，姚鼐专门写出《老子章义》、《庄子章义》等著作，阐发自己对老、庄的看法。当然，他主张兼收并蓄，也非良莠不分，而是要"于群儒异说，择善从之，而无所徇于一家。"[31]应该说，这样的主张，体现出姚鼐学术胸襟的宽广，以此，他得到众多学者的赞誉。

总之，在学术思想方面，姚鼐以理学为宗，非常尊崇程、朱，但同时又能吸纳汉学考据之长，进而提出义理、考证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，以宽容的心态兼收各家学说，其所为远非那些严守门户、固步自封的理学家可比。

注释：

[1]代表性著作有王镇远：《桐城派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）、周中明：《桐城派研究》（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）等书以及大量相关论文。

[2]马积高：《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》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）、刘再华：《近代经学与文学》（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）等少量论著对姚鼐学术思想有所涉及，但阐发较为简略，仍有深入余地。

[3][11]姚鼐：《再复简斋书》，《惜抱轩文集》卷六，刘季高标校：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102页。

[4]其实所谓"身灭嗣绝"之说，系起于方苞的"凡极诋朱子者，多绝世不祀"之语，见方苞：《与李刚主书》，《方苞集》卷六，刘季高校点：《方苞集》上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140页。

[5]姚鼐：《程绵庄文集序》，《惜抱轩文集后集》卷一，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第268页。

[6][8][10]姚鼐：《复曹云路书》，《惜抱轩文集》卷六，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第88，87，88页。

[7][9][23]姚鼐：《复蒋松如书》，《惜抱轩文集》卷六，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第95，95，96页。

[12]姚鼐：《海愚诗钞序》，《惜抱轩文集》卷四，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第48页。

[13]姚鼐：《方正学祠重修建记》，《惜抱轩文集》卷十四，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第234、235页。

[14]戴震：《与姚孝廉姬传书》，张岱年主编：《戴震全书》（六），黄山书社1995年版，第373页。

[15]关于《考工记图》的讨论，姚鼐后来写有《书考工记图后》一文以记之，文中首先说："休宁戴东原作《考工记图》。余读之，推考古制信多当，然意谓有未尽者。"接着指出了戴震释"车"之不足，最后说："余往时与东原同居四五月，东原时始属稿此书，余不及与尽论也。今疑义蓄余中，不及见东原而正之矣，是可惜也。"见《惜抱轩文集》卷五，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第76、77页。

[16]姚鼐：《述怀》，《惜抱轩诗集》卷二，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第454页。

[17][31]姚鼐：《复孔撝约论禘祭文》，《惜抱轩文集》卷六，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第92，90页。

[18][19][21]姚鼐：《赠钱献之序》，《惜抱轩文集》卷七，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第110，110、111，111页。

[20]姚鼐：《安庆府重修儒学记》，《惜抱轩文集后集》卷十，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第396、397页。

[22]按姚鼐的《赠钱献之序》等攻击汉学的文章，系在京城与戴震等往复论辨汉宋得失时所作，很有针对性，所以不乏情感色彩，甚至颇有尖刻之语。见姚鼐：《复蒋松如书》，《惜抱轩文集》卷六，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第96页。

[24]文廷式：《纯常子枝语》卷二。转引自王镇远：《桐城派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66页。

[25]姚鼐：《复秦小岘书》，《惜抱轩文集》卷六，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第104、105页。

[26]曾国藩：《欧阳生文集序》，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第14册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246～247页。

[27]姚鼐：《述庵文钞序》，《惜抱轩文集》卷四，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第61页。

[28]戴震：《与方希原书》，《戴震全书》（六），第375、376页。

[29]段玉裁：《戴东原集序》，《戴东原集》卷首，宣统二年渭南严氏成都刻本。

[30]姚鼐：《老子章义序》，《惜抱轩文集》卷三，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第29页。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师范大学　历史学院，北京　100875）

（责任编辑：张燕清）

?1994-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　http://www.cnki.net